

導論

向蘇聯學習的複雜性

白思鼎 (Thomas P. Bernstein)

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執政之初，便決意一切向蘇聯學習。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寫道：

……蘇聯共產黨是勝利了，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¹

四年之後，他又着重強調了這一觀點：

我們面前的工作是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不夠的，因此，要認真學習蘇聯的光進經驗。無論共產黨內、共產黨外、老幹部、新幹部、技術人員、知識分子以及工人群眾和農民群眾，都必須誠心誠意地向蘇聯學習。我們要學習蘇聯先進的科學技術。我們要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²

從1949到1956年，中國深入地學習蘇聯經驗，並且常常不加批判地將之實踐於眾多領域。尤其是在建政初期，中國領導人多次針對政治和發展問題向蘇聯尋求指導和建議。蘇聯對中國的影響從為數眾多的蘇聯駐華專家可以看出。從1953到1957年，約有一萬名蘇聯專家在華援建；在1954年第一季度，有403位蘇聯專家任職於28個部級機關。他

們在很多領域服務，其中教育部佔比例最大，有127位蘇聯專家，此外還有49位在石油工業部，45位在重工業部。³1960年赫魯曉夫強行撤走全部援華專家，使得兩國關係更加惡化。

然而到1956年，針對向蘇聯及東歐各國學習的路線，毛澤東拋出了相當不同的論調：

我們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過去我們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處也去學，當學到以為了不起的時候，人家那裏已經不要了，結果栽了個斤斗，像孫悟空一樣，翻過來了。⁴

在大躍進期間，中國開始摸索一條更適合自身發展和意識形態的模式，因此對蘇聯模式的批判更為深入。然而如本書所述，這些新做法依然持續受到斯大林式經驗核心層面的顯著影響。到了1960年代，從在1964年發表、或許出自毛澤東手筆的〈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的反蘇檄文可見，蘇聯已經被視為反面教材。⁵這篇文章為中國如何避免陷入蘇聯修正主義的深淵，寫出了詳細的方案。這種反蘇觀點一直持續到1976年毛去世為止。

在1970和1980年代，中國再次對蘇聯經驗產生興趣。當戈爾巴喬夫開始致力重振蘇聯社會主義時，在當時正在進行改革開放的中國，分析家開始重新審視蘇聯政策表現出來的積極方面，見羅斯曼(Gilbert Rozman)的第17章。但是當戈爾巴喬夫的開放(glasnost)和重建(perestroika)政策，逐漸瓦解了蘇聯共產黨對權力的壟斷，中國觀察家卻開始對此有所警覺。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國政府動員大批官方的蘇聯問題專家，分析解讀事件的災難性結果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於是，蘇聯再一次成為反面教材的代表，見羅斯曼、周明朗、關貴海所著章節(第七部)。⁶

中國對蘇聯經驗在態度上的反覆很值得注意。它證明了中國的發展過程與蘇聯息息相關。如羅斯曼所說：

對蘇聯的討論如此重要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一直不斷地用他們北鄰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國家。他們的世界觀與他們對蘇聯社會主義的看法密切相關。⁷

本書試圖進一步闡明中國對蘇聯模式的採納、適應和排斥這一歷史過程。這個課題過去已有許多書籍和學術論文曾深入探討。⁸但由於這些較早期的學術研究未能使用1990年代之後公開的大量文獻資料，因此值得我們重新研究。隨着蘇聯的解體，俄羅斯、中國及西方的學者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接觸到蘇聯時期的檔案資料；在中國，學者也開始有機會看到一些原始文獻，於是大批論述中蘇關係的新學術專著相繼問世。⁹

通過本書的目錄即可看出，來自中國、美國、歐洲、澳洲和台灣的學者，以不同的視角解讀蘇聯模式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的影響。本書力求描述蘇聯影響力的廣度、多樣性和複雜性。以兩個例子為證，臧健在第10章強調蘇聯模式吸引女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主張女性應外出工作。而這一理想模式在改革時期卻日漸式微，從而激發了對1950年代的懷舊情緒。第二個例子與此相反，勞倫斯·施奈德(Lawrence Schneider)在第13章指出，蘇聯在傳播李森科(Trofim Lysenko)生物學和遺傳學教條時遭到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中國科學家的抵制，從而使這些教條早在1956年就被否定了。

中國採用蘇聯模式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

中蘇關係

中蘇關係的演變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對蘇聯模式的態度。因此，我們在書中收錄了幾篇有關中蘇關係的章節：由呂德量(Lorenz M. Lüthi)撰寫的第1章描述了1949到1969年這段時期的中蘇關係；張盛發的第2章具體討論了1952年蘇聯為加強中國對斯大林的信任而歸還兩國共有共管的中國東部鐵路的重要性；王俊逸(Péter Vámos)的第3章論述了1980年代中蘇恢復邦交的史實。¹⁰1950年代上半期，在兩國關係總體比較融洽時，中國強烈希望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1956年後，中蘇關係逐漸降溫。1958年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試圖控制中國，兩國關係因此急劇惡化，由冀與焦宏所著的第5章對此有所論述。蘇聯對華援建在1960年

代中期停止，此後兩國長期保持敵對關係。中蘇關係在1980年代逐漸回暖，至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華達到頂峰；與此同時，中國對蘇聯內部不斷變化的局勢又再產生新興趣。

歷史遺留的影響

中國對外國的借鑑遠早於1949年向蘇聯的學習，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三十幾年間，「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已成為廣為人知的信條。但彼時中國對西方模式的借鑑一直僅限於科技，尤其是軍事領域，這種局限一直持續到中國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到1900年義和團起義和八國聯軍成功介入平亂以後，中國才真正開始從法國、日本、德國、美國引進政治、司法、社會和文化制度。1949年後，中國又開始全面向蘇聯學習。

論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蘇聯模式從接受到抗拒的歷程，胡素珊(Suzanne Pepper)發現它與中國過去的做法極其相似，特別是在教育上：

在二十世紀初的幾十年間，中國學習西方時所表現出的一些主要特點如今又再度出現：衝動地學習外國的成功秘訣，生搬硬套；繼而是隨之而來的混亂，及不加批判地盲目仿效外國。¹¹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中的一些中國學者，嚴格地區分了中國學習蘇聯模式的兩種情況：一種是在軍事壓制下形成的，與東歐國家類似；另一種是自發地、有選擇性地向蘇聯學習。高白蘭(Izabella Goikhman)所著第11章討論了1949年後中方在學習蘇聯模式的同時，在教育問題上保持了自主性。

另一個歷史淵源來自中國共產黨在1921至1949年間的崛起之路。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後不久，對西方幻想破滅的中國知識分子轉而投向馬克思主義，他們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及其反帝立場的啟發和鼓舞。在由莫斯科領導的共產黨國際聯合組織共產國際(1919至1943年)的引導下，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後，也積極、自願地採用了列寧主義的組織結構和運作模式。

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員，中國共產黨從屬於莫斯科，而且必須服從其指令。斯大林一向從蘇聯的國家利益出發來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致使整個共產國際的運作模式問題重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在1927年的指令，導致中共遭受嚴重損失。¹² 1930年代初，毛澤東與留蘇歸國的左翼派系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毛與「留蘇派」的一系列鬥爭，以毛在延安時期（1935至1945年）取得最終勝利告終。這一勝利穩固了毛在蘇聯控制之外的獨立地位，毛主張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發展適應中國國情的農村根據地戰略，並以此來追求一條獨立的革命之路。可笑的是，毛不得不引用斯大林時代的蘇共經典著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下簡稱《簡明教程》），來證明其自主模式的合理性。該書強調列寧為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俄羅斯情況相適應化，作出了自主創新（下文將對《簡明教程》作更多闡述）。

中共在1941和1942年間的政策，表現了毛澤東的獨立性。當時蘇聯正處於被納粹德國侵略戰爭擊敗的邊緣，斯大林因此緊急要求中共與侵華日軍正面作戰。然而毛澤東認為順應蘇聯的要求將會威脅中國共產黨的生存，因此一再拒絕該請求。¹³ 斯大林相信可以依靠國民政府，並在1945年與其簽訂條約，這使得中國共產黨人憤然不已。斯大林在1945年還敦促中共與國民黨和平相處，更在1949年中共軍隊節節勝利之時，一度警告中共軍隊不要越過長江，以免導致美國介入中國內戰。¹⁴

1949至1950年間，中共與蘇共決定在新的基礎上締結中蘇關係，雙方擱置了此前彼此間種種的隔閡。在第2章中，張盛發指出在世界政治兩極化的時代背景下，斯大林首先關注的是擴大社會主義陣營的盟友，而不是對毛澤東的不滿；而毛則更需要與蘇聯聯盟來對抗美國。

1950年代上半期，中共在蘇聯的支持下獨立掌權。在馬列意識形態與中國民族主義融合的背景下，中蘇第一階段的關係體現為中共對斯大林領導地位的服從及對蘇聯模式的接受，也就是中共定義的「蘇聯老大哥」和「中國小兄弟」的關係。這在中國文化中意味着年輕的一方有義務尊重老大哥的權威，而老大哥也有義務幫扶和保護小兄弟。這種關係只有在斯大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公認的合法領袖）仍舊在世的前提下

才能得以維持。1953年獨裁者斯大林去世後，中共對蘇聯的尊從也隨之逐漸淡漠，此後毛澤東也顯得愈來愈自信果敢。

在中國把蘇聯當作「老大哥」的時期，舊日的記憶當然並未消失。中蘇關係惡化後，中國更毫不避諱地發洩對過去的不滿。比如在1958年初的成都會議，毛澤東就重提斯大林從1930年代早期就偏愛中共左派的往事，直到中國參加朝鮮戰爭後才把毛澤東視為真正的共產主義者。¹⁵

蘇聯模式的複雜性

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斯大林的整個社會主義模式，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組成，如國有制和中央計劃經濟。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也包括了終結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及展開對城市資產階級和農村地主、富農的階級鬥爭。中國同時接受了基於大型農業生產優於家庭耕作的設想而推行農業集體化，並為了實現工業化而無條件地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抽取農業盈餘來發展城鎮工業。

很多學者認為，由於成功的蘇聯(斯大林)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是已被實踐證實過的，當時人們便將其視為中國對蘇聯發展模式的信心和確定性的來源。¹⁶當時流行的口號「蘇聯的今天我們的明天」，就表明了這一樂觀態度。

孔寒冰在第6章中指出：「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員心目中，蘇聯模式在理論上的表現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上的表現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為了灌輸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戰略，中國政府動員幹部和知識分子學習《簡明教程》。這部蘇聯共產主義發展史，也是一部由斯大林授意並親自參與編著的蘇聯經驗總結。¹⁷該書的目的是將斯大林美化為列寧當之無愧的唯一接班人，1938年出版後不久便被譯成中文，並在1942至1944年的整風運動期間就已被中共研究學習。毛澤東評價它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百科全書」，同時也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權威資源和典範。它傳達了蘇聯對階級鬥爭的強調，展示了蘇聯怎樣取得工業化和集體化的成功。李華鈺在第4章中指出，《簡明教程》

在引導中國的精英階層轉向新的觀念和方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觀念和方法在1953年底被概括為「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

然而，在1950年代前期無條件接受蘇聯模式，並不意味着中國領導人不需要對該模式的實際應用作出自己的判斷。原因很簡單，即在一些關鍵領域，中國與蘇聯的國情截然不同。例如，在工業化取得長期發展之前，中國並不具備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能力，因此需作出是否推遲農業集體化的決定。如下文所示，當時這個問題在中共領導人中頗具爭議，但是毛的激進傾向使得這次爭議很快結束。李華鈺在其優秀著作《毛澤東與中國經濟的斯大林化，1948–1953》(*Mao and the Economic Stalinization of China, 1948–1953*)中談到，從1949年起，中共的激進政策與斯大林向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建議截然相反。斯大林建議謹慎、漸進的過渡，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應在較長時期維持混合經濟。李華鈺認為，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建議實際上是陽奉陰違。¹⁸而在其他問題上，蘇聯的建議與中共的意願相一致，例如在中國應該建立集權還是像蘇聯那樣的聯邦制政體這個問題上，中國明確地偏離了「蘇聯模式」，即聯邦制的做法(周明朗的第18章對此有所論述)。

此前的討論說明了蘇聯模式的複雜性。如果進一步觀察，蘇聯模式又可再細分為三類，儘管其中各有重疊交叉，這種細分仍然具有鮮明特點並且影響了中國的抉擇(呂德量的第1章對此有所論述)。第一種模式即斯大林自1949年起就向中國建議的溫和發展戰略。溫和發展模式與中國社會主義初期建設尤為相關，但也出現在之後的階段。第二種是「革命斯大林主義」(revolutionary Stalinism)，具體體現在蘇聯1929至1934年的「社會主義搶攻」(socialist offensive)。第三種是「官僚和中產階級斯大林主義」(bureaucratic and middle class Stalinism)，它出現在斯大林後期，與毛澤東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極力維持並促進的革命價值觀有根本的衝突。

蘇聯溫和發展模式源自於列寧最後的文章〈論合作制〉，該文發表於1923年初，也就是1921至1927年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實施的初期。¹⁹新經濟政策是糾正蘇聯內戰和「戰時共產主義」期間所推行激進政策的新方案。列寧把問題聚焦於農民，並認為對農民的社會主義

改造將需時幾十年。在這段時期，農民應當借由市場、消費和信用合作的方式被納入社會主義城鎮——工業板塊的發展軌道。與此同時，隨着農村文化革命的掃除文盲工作，農民將逐漸適應社會主義方式，從而為最終的集體化鋪平道路。

在1920年代中期關於蘇聯工業化的辯論和權力鬥爭中，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進一步闡釋了列寧的思想，強調需要安撫農民而不是發動農村階級鬥爭，並在農業和工業發展採取相互依存、共同促進的方式來保持農民的積極性。直到1927年，斯大林都公開支持布哈林的主張。²⁰ 儘管布哈林在1938年被扣上「人民公敵」的帽子遭槍決，他的名字也被禁止提起，但是其主張卻為一些中國領導人所熟知(侯曉佳在第7章中指出了這一點)。由此可見，溫和模式注重市場、物質獎勵和混合經濟。然而，從1920年代後期開始，斯大林重新解讀了列寧的文章，並認為列寧是在呼籲建立生產者合作社，即集體農莊。

革命斯大林主義始於1929年，蘇聯在該段時期全面發動農業集體化運動，以消滅富農對農業剩餘價值的剝削，並急速向工業化和城市化邁進。這場運動的另一個組成部分是「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其目的在於掃盲和技術培訓，但也有類似中國文化大革命時反權威的主題。²¹ 當時蘇聯在全國動員的過程中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和前進意識，許多城市年輕人因此受到極大的鼓動。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革命造成的生命損失和各種苦難非常巨大，尤其是在農村，但是蘇聯的工業化卻的確得以迅速完成。由此看來，毛澤東對「革命斯大林主義」的核心價值如此着迷也就不令人意外。

第三種方式「官僚和中產階級斯大林主義」反映了趨向穩定的特點。在計劃經濟和國家集權的庇護之下，巨型官僚體制應運而生，他們極度依賴於制度、常規、監管和物質刺激。技術精英尤其受到重視，嚴重的不平等也因此產生。西方學者從中看出革命動力的日漸消弭以及體制僵化的徵兆。²² 鄧納姆(Vera Dunham)在其力作《在斯大林的時代：蘇聯小說中的中產階級價值觀》(*In Stalin's Time: Middleclass Values in Soviet Fiction*)中，描寫一個貪得無厭的新階層的出現，而這一階層成為了社會體制的重要支柱。²³

那些在1950年代初來到中國的蘇聯專家在不同程度上就是蘇聯官僚主義的產物。一個生動的例子是蘇聯公安專家對1951年中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態度轉變。那次運動依靠的是發動群眾，而不是斯大林主義所推崇的「穩定性、形式化和專業主義」。蘇聯顧問對這項長期的、具有強烈煽動性的政治運動表示憂慮，因為「自從他們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就沒見過此類行動」，也就是革命斯大林主義時期。據報道，蘇聯顧問後來逐漸接受並相信中共做法的優點。²⁴毛澤東此後在大躍進時期對官僚斯大林主義充滿憤怒，也就不足為奇了。以上三種方式都是中國的政治爭端和操控的主要議題。²⁵

蘇聯模式和向社會主義轉型

在1950年代最初期，中國把自己的社會發展階段定義為「新民主主義」，即多種經濟並存，主要產業已實現國有化，但還存在相當一部分私營製造業、貿易企業以及私營手工業。在農業方面，在地主被強行沒收土地後，佔主導地位的是擁有私產的小土地所有者。中共領導人認為在適當時候，生產資料私有制必然將被廢除，但問題是，新民主主義階段應該持續多久？

在中國領導人看來，蘇聯的新經濟政策在很多重要方面與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相似。1950年夏，毛澤東指出向社會主義的全面轉型在遙遠的未來才會發生，這一論點與列寧思想高度契合。同年6月，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毛澤東重申新民主主義將會持續很長時間，而在此期間，向社會主義過渡所需的條件也將逐步成熟。他向焦慮的工商業人士表明，向社會主義過渡將需時20至30年。實際上，黨內討論已將預計時間縮短至10、15或20年。²⁶在其後一年內，毛澤東開始有了縮短過渡期的想法。

然而劉少奇等領導人，繼續堅持新經濟政策和斯大林的溫和發展建議。薄一波在其回憶錄中講到，劉少奇認為經濟發展的優先順序應為先農業，輕、重工業分列第二和第三，這與布哈林的主張頗為類似。劉還認為，在工業能促成農業機械化之前，農業無法完成集體化；而他大力